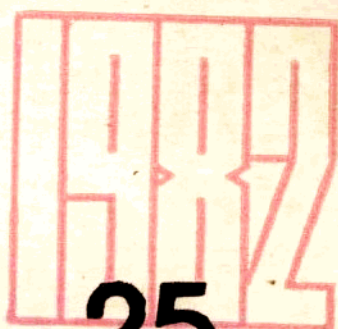




25

学 习 资 料

编辑的道德与修养

目 录

- (1) **列 宁** 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
(8) 《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的中译文
 为什么需要修改？

编 辑 修 养

- (15) **吕叔湘** 谈谈编辑工作
(28) **王仿子** 编辑要关心书的命运
(39) **曾彦修** “社风”及其他
(43) **徐 思** 谈谈编辑道德

书 稿 加 工

- (49) 编辑应用文(节选)
(69) **林烽卿** 谈编辑加工
(81) **邵仁琰** 编辑要重视原稿中的 资料
 核对工作
(85) **高 稼** 关于书籍附件的编辑 工作
(92) **史 今** 编辑与眉批

装 帧 设 计

- (95) **张慈中** 装帧设计工作的几个问题
- (108) **虞小烽** 关于古籍版面设计的刍议
- (114) **邱承德** 开本、版心、插图与整体
设计
- (123) **曹思彬** 书脊设计要有群众观点
- (125) **虞小烽** 谈版面设计

校 对 工 作

- (128) **任永长** 校对工作漫谈
- (139) **附：校对符号及其用法**

版 权 知 识

- (144) **陈 原** 版权问题问答

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

列 宁

编者按：列宁的这篇文章是中共中央编译局翻译的，原误译为《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在我国影响很大，引起了一些误解。该局认为有必要对译文重新加以校订，改正原来的误译。文后附有他们的说明。

十月革命^①以后在俄国造成的社会民主党工作的新条件，使党的出版物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非法报刊和合法报刊的区别，这个农奴制专制俄国时代的可悲的遗迹，正在开始消失。它还没有绝灭，还远远没有绝灭。我们首席大臣的伪善的政府还在胡作非为，以致《工人代表苏维埃消息报》还是“非法地”出版的，但是，政府愚蠢地试图“禁止”它所无法阻止的事情，除了给政府带来耻辱，带来新的道义上的打击以外，是不会有什结果的。

当存在着非法报刊和合法报刊的区别的时候，关于党的报刊和非党报刊的问题解决得非常简单又非常虚假，很不正常。一切非法的报刊都是党的报

^① 指 1905 年 10 月的全俄政治罢工。——译者注

刊，它们由各个组织出版，由那些同党的实际工作者团体有某种联系的团体主办。一切合法的报刊都是非党的报刊（因为政党是被禁止的），但是又都“倾向”于这个或那个政党。畸形的联合、不正常的“同居”和虚假的掩饰是不可避免的，有些人愿意表达党的观点，出于无奈而言不尽意；有些人没有成熟到具有党的观点，实质上还不是党的人，他们认识肤浅或者思想畏缩，这两种情况混杂在一起了。

伊索寓言式的笔调，写作上的屈从，奴隶的语言，思想上的农奴制——这个该诅咒的时代！无产阶级结束了这种使俄国一切有生气的和新鲜的事物都感到窒息的丑恶现象。但是无产阶级暂时为俄国只争取到了一半的自由。

革命还没有完成。沙皇制度**已经没有**力量战胜革命，而革命**也还没有**力量战胜沙皇制度。我们生活在这个时候，到处都看得到公开的、诚实的、直率的、彻底的党性和秘密的、隐蔽的、“外交式的”、狡诈的“合法性”之间的这种反常的结合。这种反常的结合在我们的报纸上也可以看到：不管古契柯夫先生如何嘲骂社会民主党的专横，说它禁止出版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温和报纸，但事实终究是事实，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无产者报》，仍然被摈斥在警察横行的**专制俄国**的大门之外。

无论怎样，已经完成了一半的革命，迫使我们大家立刻着手对工作作出新的安排。现在出版物可以成为，甚至可以“合法地”成为百分之九十是党的出版物。出版物应当成为党的出版物。与资产阶级的

习气相反，与资产阶级企业主的即商人的报刊相反，与资产阶级写作上的名位主义和个人主义、“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和唯利是图相反，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提出**党的出版物的原则**，发展这个原则，并且尽可能以完备和完整的形式实现这个原则。

这个党的出版物的原则是什么呢？这不只是说，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写作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打倒无党性的写作者！打倒超人的写作者！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全体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写作事业应当成为社会民主党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

德国俗语说：“任何比喻都是有缺陷的。”我把写作事业比作螺丝钉，把生气勃勃的运动比作机器也是有缺陷的。也许，甚至有一些歇斯底里的知识分子会对这种比喻大叫大嚷，说这样就把自由的思想斗争、批评的自由、写作的自由等等贬低了、僵化了、“官僚主义化了”。实质上，这种叫嚷只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人主义的表现。无可争论，写作事业最不能机械划一，强求一律，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这一切都是无可争论的，可是这一切只证明，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中写作事业这一部分，不能同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的其他部分刻

板地等同起来。这一切决没有推翻那个在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看来是格格不入的和奇怪的原理，即写作事业无论如何必须成为同其他部分紧密联系着的社会民主党工作的一部分。报纸应当成为各个党组织的机关报。写作者一定要参加到各个党组织中去。出版社和发行所、书店和阅览室、图书馆和各种书报营业所，都应当受党的监督，向党报告工作。有组织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注视这一切工作，监督这一切工作，把生气勃勃的无产阶级事业的生气勃勃的精神，带到这一切工作中去，无一例外，从而使“作家管写，读者管读”这个俄国古老的、半奥勃洛摩夫式的、半商业性的原则完全没有立足之地。

自然，我们不是说，被亚洲式的书报检查制度和欧洲的资产阶级所玷污了的写作事业的这种改造，一下子就能够做到。我们远没有宣传某种划一的体制或者宣传用几个决定来解决任务。不，在这个领域中是最来不得公式主义的。问题在于使我们全党，使俄国整个觉悟的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都认识到这个新任务，明确地提出这个新任务，到处着手解决这个新任务。摆脱了农奴制的书报检查制度的束缚以后，我们不愿意而且也不会去当写作上的资产阶级买卖关系的俘虏。我们要创办自由的报刊而且我们一定会创办起来，所谓自由的报刊，是指它不仅摆脱了警察的压迫，而且摆脱了资本，摆脱了名位主义，甚至也摆脱了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

最后这一句话似乎是奇谈怪论或者是对读者的嘲弄。怎么！也许某个热烈拥护自由的知识分子会叫喊起来。怎么！你们想使写作这样精致的个人事业服从于集体呀！你们想使工人们用多数票来解决科学、哲学、美学的问题呀！你们否认绝对个人的思想创作的绝对自由呀！

安静些，先生们！第一，这里说的是党的出版物和它应受党的监督。每个人都有自由写他所愿意写的一切，说他所愿意说的一切，不受任何限制。但是每个自由的团体（包括党在内），同样也有自由赶走利用党的招牌来鼓吹反党观点的人。言论和出版应当有充分的自由。但是结社也应当有充分的自由。为了言论自由，我应该给你完全的权利让你随心所欲地叫喊、扯谎和写作。但是，为了结社的自由，你必须给我权利同那些说这说那的人结成联盟或者分手。党是自愿的联盟，假如它不清洗那些宣传反党观点的党员，它就不可避免地会瓦解，首先在思想上瓦解，然后在物质上瓦解。确定党的观点和反党观点的界限的，是党纲，是党的策略决议和党章，最后是国际社会民主党，各国的无产阶级自愿联盟的全部经验，无产阶级经常把某些不十分彻底的、不完全是纯粹马克思主义的、不十分正确的分子或流派吸收到自己党内来，但也经常地定期地“清洗”自己的党。拥护资产阶级“批评自由”的先生们！**在我们党内也要这样做**，因为现在我们的党一下子就会成为群众性的党，现在我们处在急剧向公开组织转变的时期，现在必然有许多不

彻底的人（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也许甚至有某些基督教徒，也许甚至有某些神秘主义者会到我们党内来。我们有结实的胃，我们是坚如磐石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将消化这些不彻底的人。党内的思想自由和批评自由永远不会使我们忘记人们有结合成叫作党的自由团体的自由。

第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先生们，我们应当告诉你们，你们那些关于绝对自由的言论不过是一种伪善而已。在以金钱势力为基础的社会中，在广大劳动者做乞丐而一小撮富人做寄生虫的社会中，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实在的“自由”。作家先生，你们能离开你们的资产阶级出版家而自由吗？你们能离开那些要求你们作诲淫的小说和图画，用卖淫来“补充”“神圣”舞台艺术的资产阶级公众而自由吗？要知道这种绝对自由是资产阶级的或者说是无政府主义的空话（因为无政府主义作为世界观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思想）。生活在社会中却要离开社会而自由，这是不可能的。资产阶级的作家、画家和女演员的自由，不过是他们依赖钱袋、依赖收买和依赖豢养的一种假面具（或一种伪装）罢了。

我们社会主义者揭露这种伪善行为，揭掉这种假招牌，不是为了要有非阶级的文学和艺术（这只有在社会主义的没有阶级的社会中才有可能），而是为了要用真正自由的、公开同无产阶级相联系的写作，去对抗伪装自由的、事实上同资产阶级相联系的写作。

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因为把一批又一批新生力

量吸引到写作队伍中来的，不是私利贪欲，也不是名誉地位，而是社会主义思想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因为它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几万上等人”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它要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经验和生气勃勃的工作去丰富人类革命思想的最新成就，它要使过去的经验（从原始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发展而成的科学社会主义）和现在的经验（工人同志们当前的斗争）之间经常发生相互作用。

动手干吧，同志们！在我们面前摆着一个困难的然而伟大的和有成效的新任务：组织同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运动密切地、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广大的、多方面的、多种多样的写作事业。全部社会民主主义的出版物应当成为党的出版物。一切报纸、杂志、出版社等等都应当立即着手改组工作，以便造成这样的局面，即它们都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完全参加到这些或那些党组织中去。只有这样，“社会民主主义的”出版物才会名副其实。只有这样，它才能尽到自己的职责。只有这样，它即使在资产阶级社会范围内也能摆脱资产阶级的奴役，同真正先进的、彻底革命的阶级的运动汇合起来。

载于1906年11月13日《新生活报》第12号 署名：尼·列宁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2卷第99—105页）

《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 的中译文为什么需要修改？

列宁写于七十多年前的这篇文章，字数不多，影响很大。我国从三十年代起先后有过多种译文，并且被收入各种版本的经典著作家论文艺的专集。但是，所有的中译文，包括我局的译文在内，在某些关键地方始终严重不确切，引起了一些误解。如文章标题和文中的“партий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一语，在现有的中译文中都译作“党的文学”，这一提法就容易使人误认为文学这一社会文化现象是党的附属物，是党的事业中的“齿轮和螺丝钉”。读者曾就这篇译文向我们提出了正确的批评意见，我们认为有必要对译文重新加以校订，改正原来的误译，并且在这里作些说明。

由于问题涉及翻译，这里有必要对列宁某些关键用语的原文词义作简要的介绍。俄语“литература”一词来源于拉丁词“Litteratura”，已为许多西方语言所通用。这是一个多义词，主要含义有：一，泛指一切形成文字的东西，即书面著作；二，专指一切形式的文学作品，即现代汉语中所说的“文学”，为了同其他著作相区别，在俄语中有时也加限制性的定语，写成“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艺术性著作，又译艺术文学）；三，作为一切出版物的总称。“литератор”也有文学家、著作家、写作者等含义。这两个词在现代汉语中都找不到现成的、意思完全对应的用词，在翻译时只能根据它们在不同语言环境的不同含义，把“литература”分别译作“文献”、“著作”、“文学”、“出版物”、“书刊”、“读物”等等；把“литератор”译作“著作家”、“写作者”、“文学家”、“文人”等等。

“партий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这一用语在列宁著作中多处出现，它的内涵是什么呢？从形式来说，这是指党出的报纸、杂志、小册子和传单；从性质来说，是指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接受党的领导 and 监督，同党的观点保持一致，即遵守党的纲领和章程，贯彻党的策略路线的出版物。早在建党时期，列宁就开始使用这一用语，他认为要克服当时小组分散活动的“手工业方式”，建立统一的党，必须创办共同的出版物。他在一八九九年写的《我们党的纲领草案》一文中说：“生活本身要求我们必须联合起来，创办共同的刊物（литература），出版俄国工人报纸。”（《列宁全集》第4卷第201页）一九〇〇年，列宁《〈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编辑部声明草案》和《〈火星报〉编辑部声明》中又进一步说明为什么“必须出版一个共同的党的刊物（партий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即“坚持原则、能够从思想上统一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共同刊物”（《列宁全集》第4卷第286、

316 页)。一九〇三年,列宁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了《关于党的书刊工作(партий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的决议草案》,其中谈到“需要为一切居民阶层,特别是为工人阶级群众出版大批通俗的社会民主党的书刊(литература)”(《列宁全集》第6卷第427页)。这次代表大会通过的题为《关于党的书刊工作》(《О партий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的专门决议,包括三项内容:一,办好“党的中央机关报”;二,把《曙光》杂志变为“党的机关刊物”;三,“编写内容丰富的单行本读物”。(《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1分册第517页)一九〇五年七月,列宁在《〈工人论党内分裂〉一书的序言》中指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合并的组织基础之一就是:“党的一切报刊(партий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不论是地方的或中央的,都必须服从党代表大会,服从相应的中央和地方党组织。凡是不同党保持组织关系的党的报刊(партий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一律不得存在”(《列宁全集》第9卷第153页)。列宁使用党的出版物这一用语的地方还很多,这里不一一例举了。

在《列宁全集》中文版各卷中,“партий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的译法不尽统一,但意思比较接近,在绝大多数场合译作“党的书刊”、“党的报刊”、“党的刊物”等等,唯独在这篇文章中承袭了过去的译法,译作“党的文学”。

列宁在这篇文章中是否仅仅赋予这一用语以文学的含义呢?从该文写作背景和文章内容来看,情

况并不是这样的。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写于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当时正是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高潮。一九〇五年初开始的人民革命运动到秋天进入了高潮，十月全俄政治罢工预示着革命风暴即将来临，人民武装起义迫在眉睫。沙皇政府慑于波澜壮阔的革命浪潮，被迫于十月十七日颁布了一项《宣言》，答应给人民以一定的公民权利和政治自由，同意召集立法杜马（议会）。正是在革命形势一日千里地急速发展的情况下，列宁于十一月八日从国外回到彼得堡，直接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去组织群众和准备武装起义。列宁认为，要加强党对革命运动的组织领导和思想领导，党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必须进行改组，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他一回国就在布尔什维克第一个合法机关报《新生活报》上发表了《论党的改组》、《无产阶级和农民》、《军队和革命》、《向敌人学习》、《革命的文牍主义和革命事业》、《垂死的专制制度和新的人民政权机关》、《社会主义政党和非党的革命性》、《社会主义和宗教》等一系列文章，《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是其中的一篇。这些文章的内容是分析十月全俄政治罢工以后的革命形势，阐述俄国无产阶级新的斗争任务，提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新的工作方式。

还在回国以前，列宁在给党中央的信中就指出，由于革命形势发展迅速，“通过同代办秘密接头和会见时‘窃窃私语’的办法进行思想领导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应当用政治书刊（литература）

进行领导！”（《列宁全集》第34卷第348页）过去由于俄国根本没有言论出版自由，要通过党的报刊进行思想领导是无法做到的，现在有了这种可能性。但是要使党的合法报刊成为名副其实的党的出版物，能担当起思想领导的重任，还必须对党的文字宣传工作进行必要的改造。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就是为解决这一问题而写的。

在这篇文章中，列宁分析了当时的国内形势和党的报刊宣传的状况，提出了党的出版物的原则，论述了党的文字宣传工作在党的整个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它不同于党的其他工作的特点，阐明了党的宣传机构（报刊、出版社、发行部门等等）以及为党的出版物从事写作的党员和党的同情者同党的关系问题。列宁精辟地分析了写作事业的特点，指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最不能搞机械划一，强求一律，少数服从多数，最来不得公式主义。同时，他又着重批评了那种打着“思想创作的绝对自由”的旗号，企图摆脱党的领导和监督的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

列宁在文中还直接谈到了文学艺术问题，那是在什么情况下谈的呢？他在批评那些以“思想创作的绝对自由”为理由、不愿在党的出版物的公开言论中同党的观点保持一致的党员知识分子时，从两个方面批驳了思想创作绝对自由的论调。列宁讲的第一点是从“结社自由”和党的组织原则、组织纪

律的角度进行了批驳，并且指出党“有自由赶走利用党的招牌来鼓吹反党观点的人”。第二点是从阶级对抗社会中的一切意识形态都具有阶级性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出发，揭露了所谓“绝对自由”，即脱离社会阶级而自由，在阶级社会中是不可能有的，“关于绝对自由的言论不过是一种伪善而已”。在这里列宁涉及作为意识形态组成部分的文学艺术的阶级性问题，指出资产阶级作家、画家和女演员的自由不过是对资产阶级的经过伪装的依赖，生活在社会中却要离开社会而自由，是不可能的。

综上所述，列宁的这篇文章虽然谈到文学艺术问题，而且列宁的有关论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这篇文章的主旨是论文学和文学党性问题。列宁在该文中并没有赋予“партий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以文学这一种含义。原译“党的文学”是不妥当的，应当加以改正。

由于汉俄两种语言的不同，不易找到完全对应的用词，“литература”一词如何翻译，确实是个难题。经过多方征求意见和反复研究，新译文根据不同情况把“литература”分别译为“出版物”和“写作”，在谈到文学艺术的地方仍保留了“文学”的译法；把 литератор 译为“写作者”。这样既可以包括理论、政治、政论方面的写作，也可以包括文学创作，可能比较切近原意。

当然，现在这样处理从翻译的角度来看也不是没有缺陷的。一是译法不统一，“литература”一词在一篇文章中有三种译法。二是在原文中这个

词是多义词，可以包括文学的含义，而中文译作“出版物”，文学这层意思就不明显，甚至很难看出来。原文“принцип партий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在字面上与“文学党性原则”是有关联的，但是从中文“党的出版物的原则”就看不出这种关联了。这些由两种语言的不同造成的翻译上的局限，无疑是存在的。但是权衡利弊，我们还是应当首先忠实于列宁思想的精神实质，至于语言形式上的差异，在翻译无法解决的情况下，只好服从于内容。

关于“打倒无党性的文学家”的问题，这里也需要作些说明。此处“文学家”一词原译不够准确，应改为“写作者”。列宁在文中谈到党的写作事业应当成为党的工作的组成部分，而不应当是个人的事业，提出“打倒无党性的写作者！打倒超人的写作者！”。这两句话是列宁针对当时的具体历史情况说的，都是有所指的。当时形式上还处在同一社会民主党内的孟什维克，违背党的出版物应受党的监督和领导的原则，以致造成了“党是党，写作者是写作者，互不相干”的局面。列宁说的“无党性的写作者”，正是指那些不愿在公开言论中同党的观点保持一致的党员作者。而“超人的写作者”则是指凌驾于党之上、俨然以“超人”自居的普列汉诺夫等人。

这次校订主要是改正了上述关键性的译语，同时也对译文中其他一些不确切的地方作了修改。由于我们水平所限，新译文还可能有某些不妥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中共中央编译局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室1982年5月15日）